

【“苏联解体原因”笔谈】

编者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对世界政治尤其是落后的东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它在 70 多年之后的轰然坍塌同样震惊了世界,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与变迁。这样一个大国的兴起与衰落,充满着种种谜团,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本刊邀约了在这一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苏联解体原因——从斯大林体制、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治文化、改革的方式等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予以刊出,以飨读者。

青出于蓝胜于蓝 ——中苏改革斯大林模式之比较

叶书宗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也是苏联剧变 20 周年。苏联共产党创建于 1898 年,1917 年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于 1949 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的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照搬苏联经验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毫不奇怪,中国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版的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尽管从 1955 年开始,着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直到他逝世,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

恩格斯曾说,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倡导的,具有“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理性王国”,在现实世界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社会主义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但是,现实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既拒绝现代市场经济,又抵制民主法制,实在是有着太多、太严重的弊端。社会主义要前进、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关键是改革斯大林模式,完成社会主义体制转型。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就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以求实现体制的转型。可是,苏联的多次改革,始终冲不破斯大林模式的狭窄樊笼,终于导致剧变,以苏联的崩溃,结束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历史,实现转型。而中国则在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怪圈,成功地实现体制转型。中国社会主义转型,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人们不能不思考:中国和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同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祈求体制转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迥然不同的结局呢?综观两国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苏联的历次改革,都是着眼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从理论问题着手,首先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接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这样,中国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正是由于中苏两国改革斯大林模式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0 页。

不同起点,才导致后来改革的不同结局。

众所周知,斯大林模式的理论支撑,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几次强调“应该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①斯大林扭曲事实,虚构出来的这一“理论”,成为斯大林指导苏联种种政策、措施的总纲。苏联在随后实施的种种政策、做法,诸如反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大清洗,包括民族集体搬迁等种种决策都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做法。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接受、秉承,甚至发扬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无时无刻、无休无止的革命,不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中国的大发扬吗?因此,如何认识、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根斯大林模式的“中枢神经”,自然就关系到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结局。

应当说,斯大林死后,苏共最高领导层,对于改革斯大林模式,有着一定的共识性和主动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后斯大林时代的第一次会议。接替斯大林生前职务的马林科夫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认为,对个人崇拜的政策必须加以制止。”为此,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委托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负责对报刊实施监督;责成赫鲁晓夫负责审查有关纪念斯大林的文章。^②3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立即修改了已定的、严重脱离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1953年建设计划,停建包括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鞑靼海峡海底隧道等工程在内的五项大型水利工程,十一项交通运输工程,四家大型企业。这些紧急出台的措施,实际上是叫停斯大林的“政绩”工程。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苏联国家计委修改1953年经济建设计划,责成苏联财政部修改1953年各部收支平衡表,以求国民经济运行的均衡。

在实行非斯大林化方面,动作最大的要数在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中,排名第二的苏联内务部部长贝利亚。他于1953年3月13日成立了侦查小组,重新审理一些特大案件;对内务部率先改革,将原属内务部管辖的一些生产、经营、建筑单位,移交给苏联其他各部;重新审理被斯大林以莫须有罪名定罪的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案件。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在各类劳改营服刑的2526402名“罪犯”中,有孕妇6286名、孩子不满2岁的妇女35505名、50岁以上的老人238000名,对他们宜实行大赦。^③这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4月4日,贝利亚发布命令: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命令说“苏联内务部查明,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以下情况:粗暴地曲解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刑讯手段——毒打被捕者,将双手反拷在背后一昼夜、个别情况竟长达数月,长时间地不准睡觉,剥光衣服关在冰冷的单人囚室里,等等。”^④该项命令揭露说:国家安全机构的侦讯人员用这类残暴的“审讯方法”,将无辜的被捕者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⑤国家安全机构就以侦讯人员提供的这类“供词”为依据,给被捕者定罪。应当说,贝利亚大胆地率先揭了斯大林模式的最为丑恶的烂疮疤。当天,苏联就公开为曾经轰动世界的“医生间谍案件”平反。

这里并不是对贝利亚作什么重新评价,而只是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所采取的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最初行动,作简要如实的介绍。就在此时,由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不当,引发了苏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页。

② 转引马龙闪《谁是苏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第一人》,《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③ 《贝利亚关于实行大赦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3月26日》,载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396页。

④ ⑤ 《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 1953年4月4日》,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共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之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沿袭斯大林的做法,于6月26日,逮捕了贝利亚及其亲信,并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宣布贝利亚的“罪行”。7月9日晚,全国党、政、军干部分别参加干部会议,听取传达关于逮捕贝利亚,以及剥夺贝利亚一切党、政职务的通告。7月10日,塔斯社报道:几天以前,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做的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贝利亚被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2月23日,塔斯社宣布:根据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对贝利亚处以死刑。本文毋需评述已基本厘清真相的“贝利亚事件”,这里只是认为:改革斯大林模式刚刚起步,贝利亚就这样被推上祭坛,是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只着眼于具体问题的结果。“贝利亚事件”表明,苏联是奉着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改革斯大林模式;它既是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悲哀,也是改革的不祥预兆。

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也确实如此!以后出台的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每一项措施,几乎都引发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激烈争论,改革的意图扭曲,改革的措施变形,改革陷入权力纷争的政治旋涡。

最初,停止个人崇拜,在苏共新的最高领导层中,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是悄悄地“制止”,还是“反对”,抑或是公开“揭露”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苏共中央主席团发生分歧了。因为具体揭露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必然牵涉仍在台上的不同人的不同责任。此外,披露一直以来被严加封锁的任何历史事实,不仅会使仍在台上的领导人们的神圣光环失色,而且势必动摇权力基础。毫不奇怪,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成为改革斯大林模式启动后,苏共中央高层领导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关注民生、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调整外交方针等问题,也是如此。

斯大林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萎缩,造成工业结构畸形。多年来,人民一直忍受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之苦。加大对轻工业的投入,生产能满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几乎是苏联民众对政府的渴望。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的演说中,就提出:要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关注度和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要在2—3年内大大地增加供应居民的各种消费品。就在这次演说中,马林科夫也提到: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马林科夫承诺:政府将提高畜产品和蔬菜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制以外的农副产品;减低农业税额等等。

关于外交的基本方针,马林科夫提出:巩固和平,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不是策略和外交手腕问题,而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①从马林科夫的演说来看,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马林科夫决意全面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全面调整的基本决策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的。

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些政策的调整中,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又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先后导致1953年9月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在垦荒问题、发展轻工业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是否应在苏共20大上公开揭露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导致中央主席团内部矛盾激化,直至发生1957年6月的“马、卡、莫‘反党集团’事件”。在处置“反党集团”事件中,赫鲁晓夫虽然取胜,实际上有侥幸的成分。这种侥幸的成分,也导致赫鲁晓夫因改革的失败而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一段时间还颇有起色。由于也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当改革深入下去之后,部分各级当权者出于利害关系,立即声讨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全国上下大批特批“市场社会主义”,最终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无息地消失。

总之,苏联的改革都着眼于具体的问题。无论改革哪一个具体的问题,都牵涉各级当权者的利益,苏共各级领导层就发生分歧、争论。如此这般,决定了改革的失败结局。

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身后留下的问题着实是中国的巨大包袱。像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也搞个人崇拜。至于具体问题,1955年的“肃反运动”,制造的几乎都是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

^①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

派斗争”55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群中,很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几乎都是错划的;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是冤狱。至于“文化大革命”,更使全国上下干部遭殃,学校停办、教育事业瘫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科学文化事业整体断裂。其余像“三面红旗”、“三线建设”等等,留下的也几乎都是烂摊子。回顾36年前中国的状况,无论是问题的成堆之多、急需解决之迫切、严重之程度,实在比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更糟糕。

所幸邓小平高瞻远瞩,谋略过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就事论事地拘泥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是首先否定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驱散了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挖掉了斯大林模式的根。全党和全国人民因而重新认识了国家的神圣,明确了国家的根本、基本职能在于强国富民。具体来说就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理论上拨乱反正之后,才去平静地解决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时,邓小平坚持对事不对人。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强调“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①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和事,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样,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斯大林模式是按照国家法制程序进行,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仍然奉着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去改革斯大林模式。

中苏两国同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由于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起点,就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这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非世界历史性:苏联剧变的重要成因

韦定广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所谓“苏联剧变”,既指共产党丧失政权,也指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为什么这样一个几乎集中了全部权力的大党、老党及其国家在经历了74年的风风雨雨后,却在朝夕之间惨遭此命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在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中时常被忽视,那就是苏共执政中的非世界历史性特征。

“世界历史性”,是马克思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以世界普遍交往为事实前提,在性质上与地方性或地域性存在相对立,后者意味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处于相互隔绝、闭关自守状态。如果这样,那么共产主义非但难以避免贫穷甚至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且还只能“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②综观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执政可以说成也在斯大林模式败也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既具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十年国际经济、政治的重要反映;不但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思想文化、性格特征的烙印,而且也代表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类落后国家执政的共同特点。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基本取得共识的分析来看,^③非世界历史性应该是其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② 引文及基本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③ 目前国内外对斯大林模式在体制方面主要特征的概括,主要有下述九种:超级集中或超级集权体制;行政命令体制;兵营式保守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专横官僚体制;战时体制;极权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陆南泉等人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从三个方面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高度集中、军事性和封闭性。(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466页)